

科学研究的先驱、正直领导的楷模、令人尊敬的师长

谢福明

我认识谢毓元先生应该追溯到1981年，当时他以中国访问学者的身分访问日本东北大学药学院，而那时我到日本东北大学药学院开始留学生活一年多。我出席了谢先生当天在东北大学药学院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就为他精湛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流利地道的英语学术报告深深感染、深深打动。学术报告会议以后，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陪同他参观了当时的日本东北大学药学院的教学、科研设施。他当时已经是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而我仅仅是一个刚刚赴日的留学生，我们以前又是素昧平生、从不认识。可是他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却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平易近人，使我感到我不是在和一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交往，而是在和一个早就熟知的亲人在交流，和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老师在探讨学问，在我的内心深处，深深感到他确实是一个可敬可亲的师长。从那以后，我和谢先生的信件交往就一直没有间断。在留学日本期间，我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愿意向他倾诉，我取得一些学术成果或有了喜悦的时候，也愿意与他分享。而每一次与他的交往，都使我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教育、学术上的提高和精神上的升华。

1985年底，在我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同时也面临了何去何从的去留问题。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还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也还比较差。我的日本导师南原利夫教授在日本药学界有很高名望，对我也十分关心，加上他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也十分了解，所以他主动提出，等我完成学业以后，他愿意把我介绍到日本的大的制药企业去工作。他真诚地表示，他能够理解也非常支持我希望回国为国效力的愿望，但是希望我至少能够在日本制药企业工作几年，有了足够的个人经济实力，再回中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他也相信，只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科研条件和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善，到那个时候回国，我更可以做出成绩来。他同时指出，我如果在日本制药企业工作几年，这样的经验对我以后回国工作也一定有帮助。当时我感到有些踌躇，就把这些信息和个人去留取舍上的困扰告诉了谢先生。不久他就给了我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列举了国内科学研究的现状、陈述了国内对人才的渴求，指出了国内发展的新的气象和辉煌的远景，同时也坦诚地告诉我国内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与日本的差距，最后他建议我放弃个人的得失，回国效力。1986年春天，当我再次在日本东京和他不期而遇时，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经李政道博士建议和邓小平首肯，中国科学院开始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以便吸引国外的科技人才回国工作，而上海药物研究所就将建立当时国内的第一批、也是药物研究所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所以他恳切的建议我到上海工作、

学习。他向我表示，虽然生活条件无法和日本相比，但是假如我愿意到上海药物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作为药物研究所的所长的他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为我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当时他还告诉我，他那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和日本的一家公司探讨合作研制开发新药的事宜，药物研究所当时就缺乏我这个专业的人来承担与这家制药公司合作的相关研究，他希望我能够接受他的建议和邀请，到上海药物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并承担与日方合作的科研项目。得到他的这些信息以后，我放弃了在日本工作的机会、也放弃了国内其他单位提供的工作岗位，而成了上海药物研究所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个博士后，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指导博士后的研究的导师正是当时担任药物研究所的所长的谢毓元院士。

在上海药物研究所两年的博士后和两年的副研究员的学习工作中，我更加近距离的与谢院士相处，得到他面对面的指导和教益。按照常理，我和他仅仅是上下级、师生之间的关系，可是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他亲自过问，并指派专人负责解决我爱人调进药物研究所工作的事宜，这使我们都非常感动。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导师如此关心，学生焉能不尽力完成科研任务呢？谢先生在科学研究上有过人的见解、有傲人的成就，是非常出色的学术带头人，他的科研成果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是上海药物研究所最早转让给了企业生产的成果之一。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他的领导才能也是众所公认的。在他领导药物研究所的几年中，药物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显著增加、与国外的交流快速扩大，药物研究所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我参加接待访问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日本制药企业代表团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时的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白东鲁教授向日本客人介绍谢先生时指出，谢所长不但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出色的外交家和谈判专家，上海药物研究所与国外的交往合作那么多，主要归功于谢所长出色的外交才能。我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学习工作的几年亲身感受到谢院士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开展与国外交流合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特出贡献，我自己也是这种交流合作的受益者。我当时的科研项目就是他和已经在日本定居的原上海药物研究所教授洪山海先生共同努力促成的。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和日本昭和药化公司合作而得到日方资助，也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能开展科研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所以，假如说在药物研究所博士后两年的学习科研中，我能够取得一些科研成果的话，不但与谢院士在学术上严谨的指导和及时的帮助分不开，而且也与他的出色领导和善于与国外交流合作的才能分不开。而特别令我敬重的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高超才能的领导，而且是一个非常正直的领导。他善于团结，也疾恶如仇，他不因为对方是小人物就不关心，也不因为是骨干就牵就。他不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处处身教重于言教，而且对他的学生、对他自己科研组的人员也严格要求、一视同仁。他对我的正当的要求和合理的建议予以重视的同时，也告诫我不要因为是他的博士后就放松自

己，更不能有优越感，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虽然离开药物研究所十几年了，他对我的这些教导却成了我终生的财富。

我常常想，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缘份存在的。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第一个接待的国内访问学者是谢院士，我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后接待的第一个国内访问学者也是谢院士，而1993年我到现在工作的美国生物分析系统公司后，第一个接待的国内访问学者还是谢院士，这应该是缘份多于巧合吧。在美国两次接待他，我都感受在科研方面他仍然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在推进国内的科研、推动药物研究所的发展方面，他仍然是那样的远见卓识。每次和他交心，他都叮嘱我，不管在那里工作，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生养自己的中国，不要忘记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单位、不要忘记曾经关心支持过自己的同仁，亲情和友情永远是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我一直把他的这些教导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这些年我一直希望为自己学习工作过的药物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虽然也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些，遗憾的是因为个人能力及各种因素，至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我真诚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为上海药物研所的发展做得更多，这样等到十年后再次庆贺谢先生九十岁华诞的时候，我能够无愧的告诉他，我已为上海药物所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